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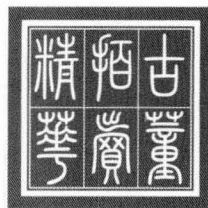
銅器

古董拍賣精華

GU DONG PAI MAI JING HUA

編著 金 良





古董拍卖精华

GU DONG PAI MAI JING HUA

瓷器

编著 剑 矛
方昭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董拍卖精华. 铜器/金良编著.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356-5196-9

I. ①古… II. ①金… III. ①铜器(考古)—拍卖—中国—图集 IV. ①F724.59-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2884号

古董拍卖精华·铜器

出 版 人 李小山

编 著 金 良

责任编辑 李 坚

责任校对 陈银霞

封面设计 骆 沛

出版发行 湖南美术出版社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0
书 号 ISBN 978-7-5356-5196-9
定 价 88.00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转载】

邮购联系:0731-84787105 邮 编:410016

网 址:<http://www.arts-press.com/>

电子邮箱:market@arts-press.com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755-82409915

目 录

凡 例 / 5

前 言 / 6

容器类

商晚期 青铜兽面纹三足鼎 / 23

商晚期 蝉纹铜鼎 / 24

商晚期 兽面纹分裆铜鼎 / 25

商晚期 鸟形扁足铜鼎 / 26

西周 兽面纹铜鼎 / 27

西周 兽面纹铜方鼎 / 28

春秋 蟠龙纹铜鼎 / 29

战国 蟠虺纹铜鼎 / 30

商晚期 兽面纹铜鬲 / 31

西周 兽面纹铜甗 / 32

春秋 交龙纹铜甗 / 33

商晚期 兽面纹铜簋 / 34

西周 兽面纹铜簋 / 35

清 洒金兽面纹铜簋 / 36

西周 重环纹铜盃 / 37

春秋 龙纹铜簋 / 38

战国 蟠虺纹带盖豆 / 39

商晚期 兽面纹铜壶 / 40

西周 波曲纹铜壶 / 41

西周 兽面纹铜壶 / 42

春秋 兽耳铜方壶（一对） / 43

春秋 鸟盖铜匏壶 / 44

战国 镶嵌蟠蛇纹铜扁壶 / 45

战国 错金银变形兽纹铜扁壶 / 46

战国 镶嵌几何纹铜方壶 / 47

战国 狩猎纹铜壶 / 48

清 兽面纹铜方壶 / 49

商晚期 父己祖辛铜尊 / 50

商 兽面纹铜尊 / 51

西周 凤鸟铜尊 / 52

西周 兽面纹铜尊 / 53

清乾隆 鎏金龙纹铜方尊 / 54

明清 铜嵌银丝兽形牺尊 / 55

商晚期 卫父铜卣 / 56

商晚期 兽面纹铜卣 / 57

西周 兽面纹铜卣 / 58

明 鸟纹铜卣 / 59

清 兽面纹铜卣 / 60

西周 龙纹铜盃 / 61

商晚期 兽面纹铜甗 / 62

商晚期 兽面纹铜甗 / 63

商晚期 火纹铜甗 / 64

商晚期 兽面纹铜方彝 / 65

宋 兽面纹铜觥 / 66

清 海水龙纹瓶 / 67

清 错金银双耳瓶 / 68

清乾隆 龙凤纹铜方瓶（一对） / 69

商晚期 兽面纹袋足铜罍 / 70

商晚期 鸮形铜罍 / 71

商晚期 兽面纹铜罍 / 72

商晚期 鸮纹铜觶 / 73

西周 兽面纹铜觶 / 74

商晚期 兽面纹铜爵（两件） / 75

清 兽面纹铜爵（两件） / 76

西周早期 兽面纹铜角 / 77

商晚期 兽面纹铜觚 / 78

商晚期 兽面纹铜觚 / 79

宋 仿兽面纹铜觚 / 80

明万历 鎏金兽面纹铜觚 / 81

唐 莲瓣纹铜杯 / 82

春秋 交龙纹铜鉴 / 83

春秋 云纹铜浴缶 / 84

春秋 龙凤纹铜盆 / 85

元 水禽纹铜盆 / 86

乐器类

战国 立牛葫芦形铜笙 / 87

春秋 蟠龙纹铜搏（四件） / 88

秦 错金银几何纹铜钟 / 90

宋 兽面纹铜钲 / 91
清 鎏金云龙纹仲吕编钟 / 92

兵器类

西周 兽面纹铜戈 / 93
战国 菱形纹铜剑 / 93
清 鎏金龙纹刀 / 94

铜镜类

战国 四山纹铜镜 / 95
战国 三龙纹铜镜 / 96
战国 菱形纹铜镜 / 97
战国 连弧龙纹铜镜 / 98
汉 百乳纹铜镜 / 99
汉 草叶纹铜镜 / 100
汉 昭明铜镜 / 101
汉 博局纹铜镜 / 102
汉 车马画像纹铜镜 / 103
汉 龙虎纹铜镜 / 104
汉 重列神兽纹铜镜 / 105
晋 大康四年神兽纹铜镜 / 106
隋 团花纹铜镜 / 107
隋 传闻仁寿铜镜 / 108
唐 瑞兽葡萄纹铜镜 / 109
唐 仙人飞翔纹铜镜 / 110
唐 龙纹铜镜 / 111
唐 螺钿纹铜镜 / 112
唐 月宫纹铜镜 / 113
宋 蜻蜓纹铜镜 / 114
宋 湖州石家铜镜 / 115
辽 摩羯纹铜镜 / 116
金 双鱼纹铜镜 / 117
元 至元四年龙纹铜镜 / 118
明 洪武二十二年铜镜 / 119

宗教造像及用具

明 玄武大帝铜坐像 / 120
明 鎏金药王孙思邈铜坐像 / 121
明 张仙铜像 / 122
清 刘海铜像 / 123
北魏 蒙氏造铜佛像 / 124
北周 鎏金释迦牟尼佛及两弟子铜像 / 125
辽 观音菩萨铜像 / 126
明 鎏金观世音菩萨铜坐像 / 127

明 鎏金阿弥陀佛铜像 / 128
明 鎏金绿度母铜像 / 129
明 鎏金胜乐金刚铜像 / 130
明 鎏金莲花生铜像 / 131
明宣德 鎏金文殊菩萨铜像 / 132
明宣德 鎏金药师佛红铜像 / 133
明 铜鎏金大成就者毗卢瓦巴 / 134
清 铜鎏金十一面千手观音菩萨像 / 135
清 鎏金宗喀巴铜像 / 136
明 鎏金护法铜兽（一对） / 137
明 铜鎏金金刚橛 / 138
明 铜鎏金莲花坛城 / 139

其他类

明 鎏金海兽铜水盂 / 140
明 牛首笔筒 / 141
明 山峰形笔架 / 142
明 兽形铜镇纸 / 142
西汉 盒形四足灯 / 143
西汉 五牛筒形贮贝器 / 144
清 八宝纹铜熨斗 / 145
清乾隆 虎头铜像 / 146
清乾隆 牛首铜像 / 147
清乾隆 猴首铜像 / 148
西汉 龙纹熏炉 / 149
明 文官骑马铜香熏 / 150
清 鎏金瑞兽熏炉（两件） / 151
清顺治 三足铜炉 / 152
清康熙 长方形铜炉 / 153
清 云龙纹铜炉 / 154
汉 铜马 / 155
宋 胡人献宝铜像 / 156
元 童子铜立像 / 157
清 铜麒麟 / 158
清 铜狮 / 159
清 牧牛铜像 / 160

凡 例

1. 《古董拍卖精华》分竹木牙角卷、瓷器卷、玉器卷、翡翠卷、铜器卷、古典家具卷共六卷，收录了纽约、伦敦、香港、澳门、台北、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广州、昆明、成都、济南等城市几十家拍卖公司1995-2010年拍卖记录中精选出的具有代表性的拍品每卷150余幅。拍品选录从时代风格、质地、器型、纹饰、工艺、功能、文化内涵、价值等方面考虑。其中包括部分未成交拍品。
2. 本书内文条目原则上保留了原拍卖记录，按朝代、品名、尺寸、成交价（或估价）、拍卖公司、拍卖日期、拍品分析等排序。
3. 因境外拍卖公司宿地不同，本书中拍品价格，USD美元、EUR欧元、GBP英镑、HKD港币、TWD台币均按当时汇率转换成人民币币种价格。

前言

中国青铜器市场探讨

金 良

要对中国青铜器的市场发展有清醒的认识，就必须对中国青铜器的特点、价值和市场的形成等方面的情况有足够的认识。

一、中国青铜器的收藏历史和现状

青铜器出土的最早记载始于汉代，当时的人们把青铜器的出土视为祥瑞。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武帝时，“上有古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已而案其刻，果齐桓公器。一官尽骇，以为少君神，数百岁人也”。据《汉书·郊祀志》记载，汉宣帝时，美阳县(今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附近)出土了一件铜鼎，献给皇上以后，皇上一直为其如何安置它而苦恼。大臣们有的认为应该把它好好地供养于宗庙，但时任京兆尹的张敞释出鼎上有“王命尸臣：‘官此邑，赐尔旗鸾黼黻珌戈。’臣尸拜手稽首曰：‘敢对扬于天子丕显休命。’认为该鼎出于周人旧居之地，又记录了周王褒赐大臣的内容，其子孙刻铭颂扬祖先功烈，所以此鼎不宜存之于宗庙，而应该藏于家庙之中。《后汉书·窦宪传》记载，和帝永元元年九月，窦宪伐匈奴，南单于于漠北遗宪古鼎，鼎上有铭文“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宪乃上之。《梁书·刘显传》载：“时魏人献古器，有隐起字，无能识者，显案文读之，无有滞凝，考校年月，一字不差。”《梁书·刘杳传》记载，了刘杳和沈约讨论宗庙牺樽问题，认为：“古者尊彝皆刻木为鸟兽，凿顶及背以出内酒。顷魏世鲁郡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牺樽，作牺牛形。晋永嘉贼曹嶷于青州发齐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为牛象。二处皆古之遗物，知非虚也。”宋代学者王应麟《玉海》卷八八载：“开元十三年十月壬申，万年人工庆筑坦掘地，获宝鼎五，献之。四鼎皆有铭，铭曰：垂作尊鼎，万福无疆，子孙永宝用。”这时期出土的铜器，大都献于皇上，藏于皇宫。清代学者阮元将这一时期的铜器状况总结为：“自唐至汉，罕见古器，偶得古鼎，或改元，称神瑞，书之史册，俄臣节能辨之者，世

惊为奇。”

中国青铜器市场在宋代开始形成，也出现了铜器收藏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宋史·礼志》说：“初议礼局之置也，诏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属。其后又置礼制局于编类御笔所。于是郊庙禋祀之器多更其旧。”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中还说到，宋太祖时，王朴善铸编钟，能与周代铜钟形状一样。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干州上献古铜器，其形状大约呈方形，并配四足，上刻铭文21个字，其铭为“维六月初吉，史信父作鬲甗，斯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真宗令儒臣考证，认为是史信父甗。宋徽宗好古物，官廷作坊依照出土铜器大量仿制，曾以春秋晚期宋公戌钟为蓝本新铸大晟编钟，器形纹饰无不仿制得惟妙惟肖。宋代皇室搜罗铜器很有成效，大观初年，宣和殿收藏大小青铜器仅500多件，到了政和年间，皇宫里的收藏已达6000余件。宋代的达官贵人、文人学士也收藏铜器，宋人陈思在《书小史》卷九中记载，“曹王属有献古鼎，篆字二十余字，举朝莫能读，昭甫尽能读之”。据北宋《考古图》和南宋《续考古图》称，北宋收藏家有40多位，南宋30多位。在达官贵人中，如寇准、文彦博、刘敞、苏轼、李公麟、欧阳修、吕大临、赵明诚等，无不以收藏青铜器为荣耀。苏轼的书房里就“清供”着鼎鼎大名的楚王钟。刘敞是集贤院学士，收藏宏富，著有《先秦古器记》，他最为珍视11件有铭文的青铜器，平生把玩，至死不忘，并告诫后辈：“我死之后，不要忘记用它们来祭祀我。”可见一代文人学士之风尚。清代学者阮元总结这一时期是：“北宋以后，高原文冢搜获甚多，始不以古器为神奇祥瑞，而或以玩赏加之。学者考古释文，日益精核。”

宋代学者研究古代青铜器的方法，在定名上正如王国维所说：“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曰钟，曰鼎，曰鬲，曰甗，曰敦……皆古器自载其名，而宋人因以名之者也。曰爵，曰觚，曰觶，曰角，曰斚，古器铭辞中均无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然至今日，仍无以易其说。知宋代考古之学，其说虽疏，其识则不可及也。”他们开创的以《考古图》和

《宣和博古图》为代表的著录体例，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宋代奠定了古代青铜器的研究基础。

由于乾隆皇帝的大力倡导，青铜器的收藏和鉴赏于清代又火热起来了。除了宫廷收藏，官僚士大夫也嗜古成风，出现了一批收藏大家。1749年，乾隆帝指使廷臣梁诗正仿照宋代《宣和博古图》的式样，编撰了一部《西清古鉴》甲乙编各20卷，著录清宫所藏铜器1436件。后来又有王杰等编《西清续鉴》甲乙编各20卷，共著录宫廷铜器1642件。再后来又将宁寿宫里的古物统计汇编成《宁寿鉴古》16卷，共收青铜器600件，铜镜101面。此三部大书，大体反映了乾隆时代的宫廷铜器藏品。

达官贵人和文人士大夫的收藏则更具考据意味。嘉定人钱坫（1744—1806）著有《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4卷，收录商周青铜器25件，其他24件，共计49件。阮元（1764—1849），乾隆进士，嘉道时曾任户、兵、工部侍郎，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他的收藏被编入《积古斋藏器目》和《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两书，前者收录钟、鼎等铜器共74件，后者收录商周青铜器达446件，其他古物105件，共551件。其收藏之丰，民间罕有可比。其中齐侯罍大小两具，后归吴县吴云，吴云因此称其居“二壘轩”，历来被视为珍品。山东潍县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号篚斋，是著名的收藏家。他官至翰林院编修，一生唯古物是嗜，收藏宏富，又精墨拓，著有《篚斋古金录》、《十钟山房印举》、《篚斋藏古目》、《篚斋藏古玉印谱》、《篚斋藏镜》、《篚斋藏古册目并题记》、《封泥考略》（与吴式芬合辑）、《篚斋金石文考释》等，以最早收藏毛公鼎及一大批商周青铜器和秦汉古印名闻天下。后来，又有吴式芬撰《捃古录金文》3卷，著录商周青铜器1334件。吴大澂撰《愙斋集古录》26册，著录商周青铜器1048件，另有《愙斋藏器目》著录青铜器211件。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著录青铜器47件。曹载奎《怀米山房吉金图》著录60件。吴云《两壘轩藏器目》著录60

件。《两罍轩彝器图释》著录103件。丁彦臣《梅花草堂藏器目》著录37件。叶志诜《平安馆藏器目》著录161件。张廷济《清仪阁藏器目》著录64件。程振甲《木庵藏器目》著录54件。刘喜海《长安获古编》著录商周秦汉礼乐兵器79件。方水睿益撰的《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30卷尤其详细，不仅著录商周青铜器达1000余件，而且其中重要铭文都附有考释，卷首有《彝器说》3篇，上篇考器，中篇考文，下篇考藏；尤其是下篇，对前代重要的彝器收藏和流传情况，均作了珍贵的记录。其中清政府工部尚书潘祖荫酷爱青铜器，在他的藏品中，以西周的大克鼎和大盂鼎最引人注目。大克鼎高93.1厘米，重201.5公斤，通体饰变形兽面纹，三足，立耳，庄严厚重，腹内壁还铸有铭文290字；大盂鼎高101.9厘米，重133.5公斤，三柱足，大立耳，造型雄伟凝重，纹饰简朴大方，有长篇珍贵铭文291字。这两件青铜器一直被中外官僚和富豪所觊觎。潘病故后，其家人将这两件大鼎运抵故里苏州，其间曾有美国人、日本人以及国民党要员等，纷纷采取威逼利诱手段欲得此二鼎，一美国人曾以600两黄金或一幢洋房相交换，均被潘氏家人拒绝。日军侵入苏州后，也想得些二鼎，潘氏家人怕有不测，便将二鼎深埋于庭院中。后来日本人每日都去搜查，有时一天搜查七次，因找不到大鼎才悻悻而去。1952年，潘氏后人将大克鼎献藏于上海博物馆，大盂鼎献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居延汉简、敦煌石窟藏经洞和安阳殷墟遗址的发现，极大地刺激了上世纪初的收藏界，一批卓有成就的收藏家也涌现出来，他们大都是高官或富商，其中有两江总督端方、交通总长叶恭绰，驻日公使李经方、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刘晦之，还有考古学家罗振玉、容庚，琉璃厂古玩店老板黄伯川、孙秋帆等。他们收藏或数十器或几百器，有遗藏，更多的是新出土的器物。他们之间互通信息，赠送藏器拓片，切磋考证，著录成书，互相作序、题跋，形成一个收藏圈。20世纪，中国青铜器的国际市场形成了。186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火烧圆明园，劫掠中国文物，从而认识了中国青铜器的灿烂辉煌，开始大量收购中国文物，私人的收藏品后

来有不少流入了海外各地的博物馆和艺术馆。如1890年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出土的一组青铜器，有大克鼎、小克鼎、克盃、克钟等共计120余件，其中克钟共有5件，现在是由上海博物馆收藏2件，天津艺术博物馆藏1件，日本奈良宁乐美术馆藏1件，日本藤井有邻馆藏1件。此套克钟上的铭文共79字，是分刻在各钟上的，上海博物馆和日本奈良宁乐美术馆所藏铜器为上半篇，而天津艺术博物馆和日本藤井有邻馆所藏铜器为下半篇，这为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不便。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如器身与器盖分离，同属一组的器物分散多处等。著名历史学家陈梦家曾游历欧美各国，考察我国文物流失海外的情况，结果仅从美国各大博物馆和艺术馆的收藏来看，中国青铜器就达800多件，由此编成《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一书。本书序言中介绍：“本集所收的845件殷、周青铜礼器，是我所工作人员陈梦家先生十余年前在美国搜集的。当时，他曾将在美国各博物馆、大学和古董商肆所能见到的中国铜器，都摄了照片，拓了铭文，记了尺寸，并考察了来源。其中大多数皆加以观察并作了去取，少数的未见实物。”

1949年之后，我国各地建立历史博物馆和艺术博物馆，国家鼓励收藏家捐献文物，于是青铜器涌向国家和地方的各级博物馆，私人收藏青铜器者成了凤毛麟角。其中，最著名者为李鸿章五弟的一个孙子，名叫李荫轩，藏器百余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将其全部藏品送入了上海博物馆。

1980年之后，收藏热在国内兴起，青铜器市场却没有恢复昔日的辉煌。20世纪初的北京琉璃厂，一件周代铜鼎可以换一堆乾隆官窑瓷器，而现在一件料器鼻烟壶的价格也要高于一件周代青铜器爵。有人感叹：“尽管三代铜器乃稀世之宝，但其售价还赶不上一件清代官窑瓷器，实在可悲可叹！”但青铜器在海外文物市场上却不乏上佳表现，例如：2001年春天，美国纽约佳士得在中国瓷器及古代工艺品拍卖专场上，推出了五件中国青铜器，其中一件中国商代

的青铜器“皿天全”方罍器身，以924万美元创下了东方艺术品拍卖的最高价。2007年3月31日，在纽约苏富比的春拍中，一件商晚期的鸂纹方罍以810.4万美元成交。2007年3月，在荷兰马斯垂克举行的欧洲古董博览会上，一件战国时期的青铜错金嵌绿松石獬尊，工艺精湛，华美异常，保存完好而且流传有序，终以1200万美元的天价成交，成为中国青铜器拍卖史上的第一高价，同时向世界证明了中国青铜器无与伦比的艺术价值。

2006年1月5日，在上海崇源举行的拍卖会上，西周中期的周宜壶以2640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创下了中国内地青铜器拍卖的最高纪录。至此，种种迹象表明青铜器市场开始逐步回暖。

二、中国青铜器的独特性

中国青铜器能够形成国际市场，是与中国青铜器在世界青铜文化中的独树一帜分不开的。

世界各地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不尽相同，而且其冶炼铸造技术的发展水平也不平衡。伊朗南部、土耳其和美索不达米亚一带使用青铜器，距今有5000多年的历史。欧洲地区在公元前10世纪前后已用失蜡法铸造铜器。在4000多年前的印度河流域，青铜的铸造显示出了高超的技艺，匠人们熟练运用热加工、冷加工和焊接技术制造青铜器具。埃及在公元前1567—前1085年之间已发明了较为先进的冶炼设备——脚踏风箱。美洲地区较晚，大约是公元以后的事了。中国的青铜器制造在世界各国中是比较早的，而且中国的青铜冶炼技术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

中国在进入青铜时代之前，有一个漫长的技术和经验积累过程。在距今6000年以上的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成分不纯的黄铜片。对于这个发现，考古学界曾经有过争议，但无独有偶，山东胶县三里河龙山文化遗址也曾出土两件铜锥，据分

析，为铜锌合金。经科学实验表明，这一地区存在铜锌矿或铜锌铅共生矿，人们用一种简易的方法，即能冶炼出黄铜。由于铜矿含量的不同，早期冶炼出的不一定是纯红铜。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国进入初期的青铜时代，匠人们以青铜、红铜、黄铜为原料，把热铸和冷锻技术相结合。如山东胶县三里河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铜锌合金锥；在河南临汝煤山龙山文化遗址二期出土的残铜炉中，凝固的铜液为95%的红铜；在甘肃、青海地区的齐家文化墓葬中，考古人员多次发现了青铜或红铜制作的生产工具和装饰品，有刀、斧、凿、匕等物品。这表明齐家文化已经有了青铜手工业。根据现有的材料，这时期铜器的主要特点是：

红铜与青铜并存，在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齐家文化遗址中，有好几处墓地出土了刀、锥、钻、环和铜镜，有些是青铜，有些是红铜。在制作技术方面，有锻打和范铸，都比较先进。日常工具和生活类用品占多数。青铜器还没有等级之分，一般的小遗址也出土了铜制品，可见当时普通居民也用青铜制品。这个时期的青铜制品多朴实无饰，就是有纹饰的铜镜也仅有星条纹、三角纹等几何纹饰。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有铸铜遗址和工场式作坊，出土有坩埚、炼渣、熔炉壁和数十块陶范，有的陶范上还有精美的纹饰。这时期已从铸造简单的工具和兵器发展到铸造比较复杂的容器了。目前发现的青铜容器有爵、斚、盃、鼎，乐器有铃，兵器和工具有戈、戚和形制各异的小刀、铤、凿、锥、锯等，装饰品有嵌绿松石的牌饰和铜泡。二里头文化青铜容器一般无纹饰，但有些爵的杯体正面有一排或两排圆钉状纹饰。有的腹部有圆饼状突起，当是商代早期铜器上纹饰的滥觞。虽然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上未见动物形纹饰，但二里头出土的青铜戈的内部，已有变形的动物纹饰，因而不能排除青铜礼器上出现动物纹的可能。二里头遗址的时代在夏的纪年范围之内，其铜器一般被认为就是夏代青铜器。其中青铜礼器的出现，表明这个时期已经进入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青铜时代。

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青铜文化相比，中国的青铜文化有其显著的特点，并表现在青铜容器的特殊功用上。具体来说，青铜容器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也是身份地位的体现。

古史所记的“夏铸九鼎”，便是对中国青铜器价值的一次集中体现。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用各诸侯朝贡的铜铸造了九个大鼎，鼎上铸有九州山川名物。自此，九鼎被视为国家权力的象征，拥有九鼎，就拥有全国最高的政治权力。“鼎在国在，鼎失国亡”。夏朝灭亡后，九鼎被商朝所得。商纣王时，周武王联合诸侯国伐纣，推翻商朝，建立周朝。于是九鼎成为周的镇国之宝。春秋时，诸侯国势力不断强大，周朝统治日渐衰落。齐、宋、晋、秦、楚五霸先后称雄，都有意图谋九鼎以代周室。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北伐陆浑之戎，进军周室边界，观兵周郊，以显示武力。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前去劳军。楚庄王向王孙满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知其心怀叵测，便针锋相对地回答：“一个国家的兴亡在于有没有仁德和天命，不在于有没有九鼎和九鼎的大小轻重，周王室虽然衰微，但天命未改，九鼎的大小轻重是不能随便泄露的。”

周亡后，九鼎被秦所取。公元前296年，秦昭王在运鼎回国，途经泗水时，一鼎突然跃入水中，当时打捞未果。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于公元前219年派遣千余人到泗水打捞周鼎，最后也是不了了之。而关于问鼎中原和泗水捞鼎的故事就流传下来，不但见于文献史料，还成为我们今天的口头文学。而山东嘉祥城南武宅山出土的“泗水捞鼎”画像石，更是栩栩如生地描绘了鼎被捞出水面时，系鼎绳被鼎中忽然伸出的龙咬断，鼎复落水前一瞬间的生动场面。

“以礼治国”是中国古代独特的领导艺术。以“周礼”为代表的礼仪体系，贯穿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中国数千年。“礼乐文化”在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出发点是“人禽之辨”，孔子、孟子、荀子等都将“礼乐”作为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正是“礼”使混沌未凿的原始人群有了君臣、上下、尊卑、贵贱、长幼之别，使受欲望

支配而按本能行事的自然人有了行为的规矩与尺度，从而也就使得人类进入到了一个文化的世界，一个有秩序的和谐共同体。青铜容器就是“以礼治国”的重要工具。

《春秋公羊传》何休注，天子用9鼎，诸侯用7鼎、卿大夫用5鼎、士用3鼎或1鼎。在考古发现中，奇数的列鼎往往与偶数的盛黍稷的簋配合使用，即9鼎与8簋相配、7鼎与6簋相配等，成为周代重食的组合。“陈鼎设簋，礼，所以明贵贱，辨等列也”。它是贵族在祭祀、宴食、征伐、丧葬等活动中使用的器物。在这种礼器制度中，平民百姓不能使用铜鼎，即所谓“礼不下庶人”。

周代的礼制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大量的考古材料证明，商周的礼制确实存在着损益，商周人以酒器为核心，不仅是铜器，在陶器中也可以看到，一般的墓葬都以觚和爵为组合，少的一套，多的两套、四套，而殷墟妇好墓出土的觚有53件、爵有40件、斚有12件，其中还有方形的斚，数量的多少和质量上的差异就代表着不同的身份。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商代大量的酒器就是礼神之器。商代晚期，乐器和礼器已经组合使用，殷墟妇好墓就出土有五件一组的铜铙。周代统治者总结商人亡国的经验教训，认为嗜酒是商人亡国的重要原因，因此宣布戒酒。到西周中晚期，酒器大量减少，鼎成为了礼器制度的核心。乐器也与人的身份形成组合关系，因身份的不同而存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差异，同时又在不同的场合演奏不同的歌曲。礼器和乐器在同一场合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钟鸣鼎食”就是这时期使用礼器乐器的形象记录。

中国的青铜礼器并不只是鼎、簋等器，其他青铜容器也与鼎、簋等配套使用，都属于礼器的范畴。兵器、生产工具中也有部分属于礼器。中国的青铜礼器既是物质产品，同时又是一种精神产品，承载着各级贵族的信仰与期望，也体现着他们的思想观念，这就是“藏礼于器”，

是中国青铜器的奇妙之处。

三、中国青铜器的艺术性

中国青铜器能够在世界上拥有市场，又与它的艺术魅力有关。青铜器的艺术魅力表现在构思巧妙的形态、富丽精致的纹饰、风格多样的铭文书体三个方面。

中国青铜器的数量巨大，造型丰富，品种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生活用具、货币、玺印等。酒器类中又有爵、角、觶、斚、尊、壶、卣、方彝、觥、罍、盃、勺、禁等二十多个品种。每一器种在每个时代都呈现不同的风采，同一时代的同一器种的式样也多姿多彩，不同地区的青铜器也有所差异，犹如百花齐放，五彩缤纷，因而使青铜器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以尊为例言，有圆形、方形、动物形。四羊方尊是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器身为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器外，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圈足上。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方尊的肩上饰高浮雕龙纹，双角龙首探出器表。尊的肩、腹部及圈足被设计成四个大卷角羊，增加了器物本身的变化，在宁静中突出威严。边角及每一面的中心线上的扉棱，既掩盖了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同时也用以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感，增强了造型的气势。其造型以动静结合，寓雄奇于秀美之间，可谓巧夺天工。

据分析，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羊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会贯通，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恰到好处，以异常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在商代的青铜方尊中，此器形

体的端庄典雅是无与伦比的，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在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中，有不少器物以其独特的造型而引人注目。虎卣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珍品，共有两件，后来都流到国外，一件藏于日本泉屋博物馆，一件藏于法国巴黎市立东方美术馆。其表面大部分呈黑色，局部留有很薄的绿锈。其纹饰繁缛，以人兽为主题，表现了怪异的理念。

三星堆埋葬坑中出土的青铜神树，形态基本相似，又各具特色。造型上，下端是云山状基座，主干挺拔直达树巅，九条树枝分成三层弯曲下垂，树上有立鸟、飞龙、仙果、光环以及璧瑗等器。青铜神树的造型与《山海经·海外东经》中所说有些相似：“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树上站立的鸟和光环，代表着古蜀先民的太阳崇拜，铜树在古蜀先民的幻象世界里是太阳升起和栖息之处。青铜面具硕大而威严，被悬挂在“图腾柱”上，成为当时被敬奉的主要神祇之一。三星堆的巨型人面具，是古蜀先民敬仰的神的化身。它们被制作者采用了极度夸张变形的手法，长耳、大口、高鼻、巨脸，特别是那双大眼和呈圆柱状显著外凸的瞳孔，成为“神”最突出的标志，给人以无法抵御的威慑力量。它们与人头像真实具体、比例恰当、神态庄严的风格形成鲜明的对照，所要表现的正是“人”与“神”的差别。东晋时期，常璩在其撰写的《华阳国志·蜀志》中说：“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槨，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槨尾纵目人冢也。”所谓“纵目”，就是眼睛外凸。古蜀先民用这种形象化的技法把“神”的精神凝结在青铜器之上。

古滇国青铜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器型与小型动物雕塑附饰的形式相结合或器型与独立的人物和动物雕塑的组合，这也是区别于中原地区青铜器造型的一个主要特征。其中的代表性器物是战国时期的牛虎铜案，其造型是由二牛一虎巧妙组合而成。它以一头体壮的大牛为主